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
元
明
清

已蜀書社

译注 祝尚书

审阅 曾枣庄

曾巩诗文集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曾巩诗文选译

本书责编：谢艺波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套

ISBN7-80523-357-8/Z·27
定价： (50种) 130.00元

译注

祝尚书

审阅

曾枣庄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0511/14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在我国群星灿烂的古代作家队伍中，“唐宋古文八大家”放射着夺目的光彩，而其中的曾巩，以他杰出的创作成就，历来为人所重视。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建昌军南丰县（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他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官僚家庭里。祖父曾致尧（947—1012），字正臣，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历直史馆、两浙转运使、判三司盐铁勾院、京西转运使，曾做过寿、泰、泉、扬、鄂等州的知州，有文集十卷和《仙凫羽翼》等专书数种。父亲曾易占（989—1047），字不疑，也曾登进士第，做过宜黄、临川二县尉，善写文章。

曾巩从幼年起便开始读书，逐渐对经书和历代

作家的文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决心振兴儒道，同时又树立起与古今著名作家并驾齐驱的雄心壮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曾巩十八岁，第一次上京师（今河南开封）考进士，但没有考中。在京师，他结识了王安石，并对王安石的文章极为赞赏，有“嗟予见之晚”的感叹（《寄王介卿》）。从此，他们互相切磋学问，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这一年，曾巩的父亲在知信州玉山县（今属江西）时受人诬陷，虽已澄清事实，却仍然落职归乡。由于祖父、父亲长期在外做官，所以这时南丰老家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田地，一切都得重新经营。全家生活的重担，一下落到了曾巩肩上。曾巩为了全家的衣食，不得不操持家业，下田干活，又辛辛苦苦地四方奔走，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段极艰难的生活历程，既弄得年轻的曾巩精疲力尽，从而深深体会到人生的不易，为他后来关心民生疾苦打下了思想基础；同时也游历了许多地方，增长了见识，开拓了眼界，为文学创作的丰收做了准备。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曾巩到京师入太学，再次考进士，又落了榜。他于是上书在京城做官的欧阳修，并献上杂文和时务策两编。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十分惊异，形容他的文章象“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同时也教导他写文章的方法

法，并寄托很大希望：“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滥。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送吴生南归》，《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而且十分高兴和自豪地说：选进士的人虽失去了曾巩，“而独予得也！”（《送曾巩秀才序》，同上卷四二）从此，曾巩便成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并逐渐成长为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主要作家之一。

曾巩这次到京师，据欧阳修说带了“数十万言”的文章，所以虽然考场失利，却从此以文名轰动天下。曾巩早在十二岁时就能写文章，并且“语已惊人”，而“由庆历至嘉祐初，公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林希《墓志》）。与他同时的王震后来也说，曾巩早年“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剽鸷奔放，雄浑瓌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南丰先生文集序》）可见曾巩在庆历初一步入文坛，便已身手不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曾巩方与弟弟曾牟、曾布等同登进士第。同榜的还有苏轼、苏辙兄弟。于是一代大作家，都聚会到一起了。这时曾巩已经三十九岁，他的道路实在不平坦。

第二年，曾巩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从此结束了早年读书、劳动、写作、漫游的生活，而步入了官场。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推荐他充馆职，编校史馆书籍，其间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直到英宗治平四年（1067），历时八载，虽说是做官，却多在书斋研究学问。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诏修《英宗实录》，曾巩任检讨官，不久被罢免。次年，他自求补外，于是被任命为越州通判。后又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知州。神宗元丰元年（1078），召判太常寺，不久改知明州，次年徙知亳州。元丰三年移知沧州，路过京师，神宗召见，遂留京勾当三班院。第二年七月，神宗任命他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元丰五年四月，擢拜中书舍人，不久以继母去世而罢。元丰六年（1083）四月十一日，曾巩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享年六十五岁，谥文定。

曾巩平生无所玩好，唯喜欢藏书和读书。他聚书达二万卷，亲手校勘，到老也不觉得疲倦。他收集古今篆刻，编成《金石录》五百卷。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除《元丰类稿》今存外，其余都已散佚。

曾巩生活的时代，宋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于是，上层

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在仁宗时发动了“庆历革新”，神宗时又掀起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客观上对农民也多少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改革曾遭到旧党的激烈反对，斗争十分尖锐。曾巩没有卷入当时斗争的漩涡中去，他与挚友王安石之间，在见解上也出现了不小的分歧。但是，曾巩从他的儒家思想出发，对社会和政治仍十分关切。他在许多奏章和论文中，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恶习，指出了许多社会弊端，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可见他仍然是主张变革的，对形势的认识也是清醒和深刻的。比如《议官》的要求改革官僚制度，《议经费札子》的主张省浮费、明法度，等等，都表明他仍然置身于改革的潮流之中。他与王安石的分歧，可能只是在具体的步骤和方法上。尽管如此，曾巩执行新法仍是认真的。他弟弟曾肇在《行状》中说他在知齐州时，“会朝廷变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扰。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为，公亦不听也。”

当然，曾巩毕竟主要是位作家，而不是政治家。下面我们着重叙述他的文学创作及其成就。

从《元丰类稿》和前人辑得的佚篇看，曾巩主要写作诗歌、散文，而词只有一首，可以不论。关于曾巩的诗歌，从当时到清代，一直有争论，他的

学生秦观、陈师道说他“短于韵语”，即不善作诗。这话一出，便传为口实。但后代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并据理反驳。今人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就‘八家’而论，他（曾巩）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就总体而言，曾巩诗歌的成就远不及他的散文，但他确实也创作了一些杰出的诗篇，说他不会作诗未免偏颇。不过从曾巩现存的近四百四十首诗看，平平之作也不少。这一点，何焯曾经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病根：“大抵南丰诗不能细润，只缘直以李（白）、杜（甫）、韩（愈）三家为法，六朝略不留意故耳。”（《义门读书记》卷四〇）正因为他较少学习和吸取六朝诗人的创作经验，所以相当部分作品在艺术上显得较为粗糙，这是勿庸讳言的。

曾巩的诗歌，大致古体诗学李白、韩愈，律诗学杜甫。但是前人的影响是综合的，不能一一去比附。曾巩诗歌的内容颇为丰富，部分作品继承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传统，如《追租》描写大旱后农民生活的极端困苦，鞭挞了不顾农民死活而逼租的酷吏；《叹嗟》、《胡使》、《楚泽》等诗，对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深为关注，对当政者无能安边富民极表不满，都表现了诗人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的

积极态度。咏物托志，讽谕现实，是曾巩诗歌的另一重要内容。如《高松》中以松树喻人才，对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深表不满，痛惜地问：“般匠世有无？”《庭木》诗中用“佳树”比喻国家、朝廷，而以乌鸦比喻恃宠弄权、无恶不作的权贵，警告他们“安知无刀斧”，何焯说：“篇中颇有似昌黎（韩愈）《病鸱》诗。”（《义门读书记》卷四〇）抒情言志，送人怀友，是曾巩诗歌的第三个主要内容。《冬望》诗中表现了自己刻苦读书、“欲挽白日之西颓”的雄心壮志，何焯说是“学韩亦兼有似太白处”。（同上）《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是赠友的，同时也抒发了热爱山水和思念故乡的情怀。曾巩诗歌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既有如杜甫的沉郁顿挫，也有如李白、韩愈的阔肆奇崛。至于《南湖行》的活泼明快，《城南》、《西楼》等七绝的清新，也颇令读者耳目一新。尤其应当指出的，作为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共同特点，在曾巩诗歌（特别是古体诗）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曾巩文学创作成就最大的是散文，这是历来所公认的。《宋史》本传说他为文“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同时他接受欧阳修的指导，所以文章也最接近欧阳修。曾巩与其他古文家一样，将儒家之“道”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曾巩又

与宋初以来的某些古文家对儒家经典以外概加排斥的偏狭态度不同，他接触的文化遗产十分广泛，做到博学约守。在《南轩记》中，他开列了自己处与之俱、当作益友的书籍门类，计有“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议美刺非、感微记远、山谿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野、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可见范围之广博，就连他所反对的佛老二教，对其书也进行过研究。要是没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知识积累，要想卓然自成一家，是决不可能的。当然，其中对曾巩创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先秦两汉的古文。在《读贾谊传》中，他说：“余读三代两汉之书，至于奇辞奥旨，光辉渊澄，洞达心肺，如登高山以望长江之活流，而恍然骇其气之壮也。故诡辞诱之而不能动，淫辞迫之而不能顾，考是与非则若白黑而不能惑，……既而遇事辄发，足以自壮其气，觉其辞源源来而不杂……。”曾巩在不少诗文中，都谈到他刻苦读书的情况，从上引可见他对“三代两汉之书”下过很大功夫，而且获益非浅。

曾巩没有专文谈论自己的文学主张，但从许多文章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他的观点。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他转述欧阳修对王安石文章的意见时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